

# 中国体育人的精神重构

## ——大众道德对中国武人私德至上主义思想的补救

路云亭

(上海体育学院 媒介与文化研究中心,上海 200438)

【摘要】西方现代体育作为一种高端文化已成为全人类共享的消费品。中国未曾发育出类似西方的体育文化主要是儒学的宗教化排异功能所致,其中决斗精神的沦丧直接削弱了中国人的精神强度。中西方文化中都存在过歧视身体的现象,不同处在于中国人没有类似西方的对人性的尊崇机制,结果导致竞技现象的消亡。中国的道家文化保留了部分身体关怀的基因,却因弱化竞争而最终未能缔造出高对抗性的身体文化类型。中国的道德教育体现在非神性的世俗世界里,这奠定了尚文的文化传统,中国的尚武势力恰是在尚文的宗教力量的打击下沉沦的。武士集团及其精神的陨落给中国社会带来了负面作用,中国体育人在现代社会的价值、地位、社会功用仍不明确。奥运会以及一些西方竞技体育文化类别为他们提供了临时性存在场域,但西方的体育品格仍旧无法和儒学化的东方主义精神完全兼容。中国体育人在西方人设置的竞技体育项目中获取优胜还停留在精神自慰的范畴或道德自救的想象之中。

【关键词】武士道德;大众伦理;决斗文化;体育人命运

【中图分类号】G8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973(2017)01-0035-10

就在西方体育类型大肆风行并独占世界竞技体育天下之时,中国人也在积极地讲述自己民族的体育或身体的故事。在缺失了尚武精神之后,普通的中国人逐渐淡化乃至部分丧失了对荷尔蒙主义的至高追求,而中国武人集团遭到理念性肢解后也逐渐退出了高尚集团的序列,成为一种社会边缘人。道德高地的丧失使得中国武人几乎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中国传统武人的身份符号直接干预到了当今的中国体育。如果以西方式体育为核心标准的话,中国式体育仍旧属于一种古典主义场域中的文化,而探究中国未曾发育出西方式的体育体系仍旧有现实的价值,且具有人类学、文化学和文明史的参照意义。中国武人集团在遭受儒家文化排异性打击的前提下,依然失去了在现实世界的合法身份。在与儒家文化的博弈过程中,中国武人最终只能在道德律中取得局部的优胜地位。换言之,中国传统武人之所以可以成功地递进为中国体育人,依赖的是江湖式的道德高地及其固化的下层社会角色的革命性本色。

### 一、废武尚智现象源于 尚文教派的宗教性偏见

汉代是中国武人集团产生深刻裂变的王朝。汉武帝以后,中国的武人集团逐渐演化为一种流民集团。中国的流民集团并不拥有强大的责任心、无畏的探险精神和高尚的道德律。流民集团仅只可在动乱年代欺凌平民,充其量只能做一些所谓的杀富济贫的勾当,借以彰显其片面的正义性,却一直缺乏升华为社会正义者的空间。流民的出路或许在于开垦荒地,但具有传统武士文化基因的流民的真正出路在于为国戍边,从而赢得朝廷的册封以及国人的敬重。

真实的情况却令人惊异,传统的武士化流民极少获得为国征战的机遇,大量的武士化流民无法施展出冲锋陷阵、直面沙场的本领,因此,即使号称伟大帝国的汉王朝,其对周边游牧民族的入侵也大多无计可施。“汉初的兵力极其微弱,楚汉竞争的劳民伤财只能解释这种情形的一部分。征兵制破裂,募兵制又没有完全成立,兵制不定,组织一个可用

【收稿日期】2016-11-24

【作者简介】路云亭(1967—)男,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体育文化及传播。

的军队恐怕很不容易。同时又逢边疆上有强大的部落集团出现,以致大汉帝国只能守而不能攻。汉高帝虽然统一天下,却被匈奴困于白登,后来贿赂阏氏才得脱险。高帝算是受了一番教训,从此知道匈奴不像项羽一般人那样容易对付,只得委曲求和,行和亲的政策。”<sup>[1]26</sup>由此可见,即便在汉代初期的汉高祖时代,以中原人为主体的中国人已经很难称得上是一种尚武的族类,现代中国人屡屡称呼俄罗斯、土耳其、伊朗等国家的民众称为“战斗民族”,内中应该浸透着汉民族丧失尚武精神的一种落寞之情,因为中国人从汉代以后就很难称得上是战斗民族了,其委曲求全之求生之道已然根于汉文化的深层地带。俄罗斯学者并不认为中国人好战。“说到中国人是好战、富有侵略性的民族,事实上历史证明恰恰相反。人们面对的是唯一输掉了所有战争、被任何人战胜过的民族。中国人最近一次侵占领土还是在公元七世纪,随后开疆拓土的都是征服中国的民族。中国人可以是精明的商人、手工业者、能工巧匠、农民、工艺复杂商品的制造者,却不是军人:中国人不喜欢战争,专家相信,无论现任领导人如何努力改变这种思维,都难以成功。”<sup>[2]</sup>胡适也对中国人的游戏形态作过评价:“英国的‘国戏’是 cricket,美国的国戏是 Baseball,日本的国戏是角抵,中国呢?中国的国戏是麻将。”<sup>[3]</sup>由此可见,中国人最擅长的游戏带有软性化情调,除却麻将外,蹴鞠、踢毽子、抖空竹、丢沙包、弹玻璃球之类,都属于此类。从游戏形态上也可以证明中国并非尚武的民族。

中国的尚武文化发展到战国末期出现了重大分化,其中以大量刺客集团的出现为代表。战国末期的刺客可谓一种介于西方骑士和日本浪人或忍者之间的群体。“另外一种人就专习武技,并又私淑古代封建贵族所倡导的侠义精神。聂政与荆轲的故事最足以表现这种精神。他们虽学了旧贵族的武艺与外表的精神,但旧贵族所代表的文化已成过去。”<sup>[1]9</sup>刺客依然保留了尚武之习,但已经不再为自己的尊严或为女人而战,他们更偏爱为雇主血战,将搏命之名寄托到了为他人复仇的境界,而毫无自己的价值、尊严和主导性精神追求。雷海宗认为:“这些新的侠士并无固定的主张,谁出高价就为谁尽力,甚至卖命,也正如文人求主而事只求自己的私利一样。列国的君王也就利用这些无固定主张的人去实现君王自己的目的,就是统一天下。历史已发展到一个极紧张的阶段,兵制也很自然的扩张到极端的限度。”<sup>[1]12</sup>战国末期的刺客已然开始颠

覆武士的精神,他们虽然维持着尚武之风,却丧失了自我的尊严。中国人的个体价值小于群体价值的历史格局由此拉开序幕,而后续的文化选择则是群体的价值小于集权者的价值,中国尚武文化的败灭之态从士人精神的堕落开始,其中应该包括武士精神的堕落。中国的士人在战国以后便充满了悲情。连带武士在内的士人既无法抵挡集权者的高压,又无法展示自己阶级的独立性,其为强权所压制的格局在汉代已见端倪,而其在无奈中选择非理性对抗主流社会的方法则很难为后世信奉社会公正主义的现代人所认可。

雷海宗进而阐释:“战国时代虽是战争极烈,但由军心民气方面看,两种不健全的现象也萌芽于此时:一是上等阶级的文武分离与和平主义的宣传提倡,一是一般人民中厌战心理的渐渐发生。在当时的紧张空气之下这两种现象好似都不严重,不过是狂曲中陪衬的低音。使正曲益发显得壮烈。但后代军民隔离社会解体的没落局面都孕育在这两种不甚惹人注意的现象中。”<sup>[1]14-15</sup>承续战国文化余绪的汉代初年,受到汉高祖刘邦的非贵族化、尚武化人格的影响,中国的非尚武性文化正渐次变成了社会常态,最为典型的是官场的生活。汉代文官的社会地位已经高于武官。“文官武官的相互消长也与治乱有直接的关系。盛世的文官重于武官,同品的文武二员,文员的地位总是高些。例如汉初中央三公中的丞相高于太尉,地方的郡守高于郡尉,全国的大权一般讲来也都操在文吏的手中。”<sup>[1]56</sup>汉代以后,这种风尚略有波动,且时常有反复之迹象,但基本上传承稳定且延流不绝。中国的反尚武文化一直延续到晚清及民国时期。大而言之,中国由士人主导天下的格局仅仅停留在先秦时期,到秦末已经近乎完全失效,而伴随着士文化失落的便是新一轮的崇尚谋略以及新型的原始性群体力量文化的崛起。旧有的士已经不再享受贵族的待遇,他们变成了新型的社会底层人士,而这些社会底层人士开始寻找自己独特的参与或干预政治的道路,导致原先规则化、秩序化、体系化的士文化急速退化甚至完全流失。

刘邦势力的崛起具有革命性、标志性和典型性意义。刘邦并非六国旧贵族,他代表的是新崛起的平民阶层及其利益。因此,汉代初期已然很难看到士阶层的高贵感了,更难以见到士人集团极富仪式感的决斗行为。换言之,中国从汉代开始已然出现了官方性和民间性的双向的反尚武化的文化苗头。雷海宗绝然地认为汉代已经出现了无兵的社会。

这里不妨以汉高祖丧失贵族决斗传统作为补正性材料。司马迁《史记》记载：“楚、汉久相持未决。丁壮苦军旅，老弱罢转漕。项王谓汉王曰：‘天下匈匈数岁者，徒以吾两人耳，愿与汉王挑战决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为也。’汉王笑谢曰：‘吾宁斗智，不能斗力。’”<sup>[4]</sup>刘邦放弃决斗理想而专以斗智之术争夺天下虽然符合战争诡道之逻辑性，却丧失了以个人性命相搏的高尚的决斗传统。在放弃决斗精神的意义上考量，刘邦是中国尚武文化的终结者，刘邦也就此成为中华文明史上原始主义精神沦丧的标志性人物。换言之，刘邦已经成为一种中国竞技体育精神绝失的最高级别的决策人和示范者，更是一种中国古典体育基因性消亡的政治与文化符号。

还须回到奥运会的文化体系中。以奥运会为代表的法制化体育的宗教律和道德律一直很强大。顾拜旦曾对奥运会的道德律作出过严格的界定。“参加奥运会的选手必须是纯粹的种族，没有犯罪、没有不敬或亵渎神明的行为。他们一旦‘被接受’为候选人，首先必须进行10个月的训练，然后再到伊利斯体育馆受训30天，最后才转到奥林匹亚体育馆；所有这些伦理的、道德的、社会的以及技术的保证都在一个非常明确的宗教框架中获得。”<sup>[5]114</sup>不仅如此，顾拜旦还将道德看作是奥运会生存的基本前提。“运动是在社会中发展起来的，对金钱的贪婪大有使社会完全腐烂之势。现在，对运动俱乐部来说，就是回到荣誉和真诚的准则，抛掉它们当中的虚假和伪善以树立良好的榜样。”<sup>[5]97</sup>受到制度化的儒学思想一统天下格局的影响，中国的宗教一直发育不完善，于是便有了以礼俗代宗教的传统。在中国的礼俗社会里，由于契约制度发育不健全，宗教体系不发达，民众的忏悔意识普遍淡漠，中国人的性格中逐渐萌发出一种失良的元素。清代乾隆时期的英国特使马戛尔尼曾说：“在中国期间，所有与我们有过接触的官员，无一不表现得温文尔雅，极有教养。然而，他们虽礼貌周全，却都不诚实。”<sup>[6]</sup>马戛尔尼是一位苏格兰贵族，很有绅士风度，而英国使团的总管巴罗则毫不客气地说：“这个民族（指中国人）总的特征是傲慢、自私，他们将伪装的严肃和真实的轻薄、优雅的礼仪和粗俗的言行结为一体。表面上看，他们在谈吐交往中表现得极其单纯直率，实质上他们在实践着一种狡诈的艺术……”<sup>[7]</sup>马戛尔尼和巴罗见到的中国人大多为官场中人或普通百姓，很可能未曾见到中国的民间贵族，也未曾遇到过高士、隐士、修士之类的道德典

型。因此，马戛尔尼和巴罗对中国人的评价带有片面性。其实，传统中国道德教育的主体几乎全然落在一些非神性的世俗世界里，这就给尚文的文化传统奠定了基础。西方社会以宗教代道德的做法在中国始终未能呈现，因此，中国的尚文传统带有宗教神性的绝对统治力，换言之，尚武势力恰是在尚文的宗教力量的打击下彻底崩溃的。

## 二、锦标主义成为中国式 胜利仪式的内在核心

众所周知，除却极端的恐怖主义者所捍卫的特殊教义外，世界上从未有过崇尚武力的宗教。成熟而自成体系的宗教更是以戒律为核心，构建出了一种完整的戒律文化。戒律之戒，全在于维持人类的善心。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虽然强调的内容不尽相同，但皆以向善为核心。惟独儒家教化思想未曾完全跃进为宗教，因此，儒家宗教性的向善思想和相对温文尔雅的世俗生活就形成了同质并存的局面。问题在于儒教将身体看成了非善性的存在，身体在儒教中始终是一种禁忌，儒家文化从未赋予身体太多的尊严和价值，其在文化生活中的存在空间也极为狭小，更难以确认其超凡的意义。高度认知身体重要的还是一些觉悟了的西方人。顾拜旦从未忽略过体育的教化作用。“体育具有高度的教育价值，是人类追求完美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sup>[5]24</sup>顾拜旦还在其他场合强调过体育的教育价值。“有多少自行车运动员在赛场上胆大包天，但每当步行过十字路口时却为安全而犹豫不决，有多少在水中勇猛异常的游泳选手却被人生的风浪所吓倒；又有多少击剑选手在比赛场上目光锐利，时机选择得当，但在日常生活中却做不到这一点！教育者的任务就是使那些素质在整个有机体中存在并产生结果，把它们从特别的环境移植到整个大环境中去。这就是托马斯·阿诺德所做的，也是英国教育者从他那里学来的。”<sup>[5]66-67</sup>在此意义上审视，儒家文化和以奥林匹克为代表的体育文化很难彻底兼容。近代以来，中国人热捧奥林匹克精神，企图借助外来的身体性强力思想填补中国文化中尚武元素短缺之遗憾。中国人如此的价值选择恰是看中了奥林匹克文化中蕴含的纯正、健康、符合道德律的暴力因素。但是，奥林匹克文化移入中国并非十分得顺利。中国人热捧并接纳奥林匹克赛事及其附属的文化仅仅是一种临时抱佛脚式的文化移植或借鉴工程，原因很简单，中西方文化之间不仅一

直横亘着一道很深的鸿沟,还充满了相互抵牾的动能,积淀深厚的儒家思想和来势汹涌的奥林匹克文化两两对抗,难以共融。两种文化长期的博弈已然给中国人带来了极大的心理困扰,并时常成为现代中国人的精神之殇。

出于各种原因,现代中国社会中仍有不少人迷恋奥运会以及奥林匹克理想,其中的原因较为复杂,但奥运会是一种盛大的体育赛事,它对大众的精神治疗作用十分明显,这一特质极易为中国人认同并接纳。质言之,任何形态的体育活动都有精神治疗功能,而仪式治疗本身就包含有极高的道德元素。且以2014年巴西世界杯期间的巴西足球队为例。“北京时间7月13日,巴西队还有一场三、四决赛要踢,止住连败、防止溃败,是桑巴军团疗伤的最重要一环。但就像西班牙输给荷兰后,又败在智利队脚下一样,止住连败颓势并非易事。不过,巴西人若想尽快走出伤痛,他们就必须鼓足勇气,用一场胜利为足球王国赢回尊严,这是治疗伤痛的最佳方式。”<sup>[8]</sup>大型的体育赛事也具有类似的疗伤功效,而扩展到体育政策的领域,体育自身蕴含的疗伤功能依然存在。流行于世的体育大国以及体育强国的思想便是一种国家性的精神疗伤的策略,还是一种针对文化病态社会的一种积极的治疗手段,但是,它绝非健全社会的必然性文化选择。马国力曾经分析过许多中国人情愿观看体育而不愿意参与体育的缘由。“当1981年3月20号晚上,中国男排在世界杯排球赛亚洲区预赛与韩国队比赛时,在先失两局,后来连追三局最后以三比二获胜之后,北京大学的四千多学生自发地在校园内游行,第一次喊出了‘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口号。在随后的一些年里,体育比任何一种宣传和鼓动对于激发中国人的爱国热情都显得真实而有力。于是,中国领导层和中国民众对于体育的认识从强身健体转移到了为国争光,再由于改革开放初期所有人都是夜以继日,时间就是金钱,就是效益,中国人渐渐地把体育当成了运动员的事情,对于体育的了解更多了,却都从电视上,自己参与体育的时间越来越少。”<sup>[9]</sup>由于国家宗教的缺失,不少中国人只能移情别恋,转而萌生出奥林匹克情结,很多中国人甚至像迷恋新型宗教一样迷恋奥运会及其附属的文化,执着于奥林匹克文化所释放出来的诸多炫目的谜团。“世界体育格局也是从1984年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的上任而逐渐开始改变。由于世界经济的发展,体育赛事也从‘业余’转为职业,而且大型赛事的开销也越来越大,没有来自于市场的经济支持已经无

法为继,所以世界体育开始了商业化转变。相应于当时的中国,由于中国体育的国家性质,所以以‘举国体制’来发展体育,用‘奥运战略’在世界比赛上夺取金牌,成为了符合逻辑的国策。一直到今天。”<sup>[9]</sup>中国体育人编撰的奥运题材的图书仍将奥运会当作一种超体育的文化工程来对待。“‘人文奥运’的理念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奥林匹克运动,古代奥运会崇高的理想和丰富多彩的竞赛方式都贯穿着以人为本的精神,奥运会的优胜者一向被视为善与美的典范,从而受到人们的崇拜。”<sup>[10]</sup>中国人不仅将奥运会当成一种文化工程,还将其视作一种值得膜拜的教化性力量。在北京奥运会前夕,中国各地的民众几乎掀起了一股奥运热潮,2008年的央视春晚的主题是“携手共进盼奥运”,而当年春晚最有影响力的小品是有关奥运题材的《火炬手》,《火炬手》由赵本山饰演的老头子和由宋丹丹饰演的老太太都将充当奥运火炬手看成是一种神圣行为,体现出当年中国全民性的对待奥运会的狂欢情境。2009年最有影响力的春晚小品则是《北京欢迎你》,郭达和蔡明分别扮演两个争当奥运志愿者的北京市民,同样体现出北京人对待奥运会的超级狂热的镜像。不看看出,中国人对待奥运会的狂热几乎达到一种世界奥运会举办史上的至高点。几位参加了天津市庆贺北京奥运会的活动的的小朋友曾说:“我们都有自己崇拜的奥运英雄;我们可以用画笔去描绘想象中的北京奥运会。今天把我们的斑斓梦画出来,2008年,我们要亲眼去看奥运会。”<sup>[11]</sup>中国人如此热恋并拥戴奥运文化的格局至今未曾改变。

时至今日,不少中国人依然十分在乎在奥运会上夺得的金牌数,中国体育界的部分人士一直将在奥运会上夺牌当作事业成功的标志。这种成就观本身就充满了历史的局限性。质言之,中国是否需要类似这样的宗教热情?仍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东京申办2020年奥运会成功后,雷默认为:“东京申奥成功,从某种程度上避免了在未来几十年内,国际奥委会再次推出中国某个城市举办奥运的计划。因为同一大洲城市举办奥运后,将在一定时期内不再在此大洲举办奥运。所以,这是中国人的一次机会,一次可以静下心把钱放在发展上的机会,从现在开始到2020还有7年时间,这7年时间里,中国将发生多么巨大的变化,没有人敢于预测。但中国人可以想像的是,日本人会利用这次机会再一次发展他们的首都,这将是亚洲的一次良好的竞争。在这个期间,我希望中国人能静下心,好好的



观察日本的发展,因为这个民族还有大把值得中国学习的地方。”<sup>[12]</sup>2016年,美国心理学家对成功人士作出了新的解读,美国学者认为人生成功的指标是一个人一生中獲得愛和施加愛之程度。换言之,成功人士的初级标志是创造过一定的财富,但最重要的是得到过足够的愛,接受过健全的人际关怀,并懂得关怀他人。现代中国人所理解的成功却依然停留在超越他人、金山银山、子女成群的格局中,甚至还带有妻妾成堆、欺男霸女、自我神化之类的旧式迷梦,其中不乏抗拒现代性的腐朽思想。同样的道理,中国人所拥戴的奥运会梦想仍然属于一种貌似高端实则陈旧或衰朽的非理性的念想,它也同样远离了现代性。

中国的体育界同样面临现代性元素严重匮乏的问题。再以武术为例,中国武术人不遗余力地要将诸如武术之类的文化类项目纳入到奥运会项目中去。殊不知,武术和奥运会充满了巨大的冲突感。严格而论,武术本身并不属于体育,中国体育界的相关设计者将武术放置到体育系统也仅仅是一种权宜之计,武术入体育行只能说是一种寄存行为,武术和现代体育的分裂关系始终存在。随着传统武术价值的回归,武术的非体育特性再度彰显出来,武术的真正归属只能是国学机构,它理应和中国传统哲学、诗文以及琴棋书画之类放置在一起,共同完成其生态性复活之使命能。膜拜奥运会还有额外的文化生态性危机,完全接纳奥运会及其文化意味着一切向奥运看齐,结果只能导致中国大量的传统体育项目面临灭失之危险。

这里有必要探究一下中国人热捧奥运会以及西方的体育形态的动机问题。质言之,任何一种心理驱力是自然生成的,绝非一种国家权力简单灌输的结果。中国人热捧并接纳奥运会以及其他西方体育项目具有现实功利性的合理性,但是,相反的情况也会呈现,在西方体育观的支配下,中国原始的体育文化开始遭受到压制,中国原始体育项目中原本就少却尚武的元素,于是便出现了一种互补性需求,中国人迫不得已在西方的体育文化中求取补药,借以维持自己文化的均衡感,然而,任何一种借鉴活动都能伴随有一定的风险。顾拜旦曾说:“今天,当对金钱的贪婪导致万恶横流,煽动可耻破坏,现在危及由那些牺牲者的勇敢和英雄主义所赢得的自由时,当良心似乎偶然失去公正时,当忠诚似乎被削弱时,当务之急应该为青年开办一所实践骑士精神的学校。在这所学校里,青年们将懂得胜利依靠顽强拱搏的意志和坚韧不拔的毅力,依靠正直

和忠诚的无私奉献。这所学校就是运动。”<sup>[5]81</sup>奥运会中蕴含的普遍的公正意识、勇敢精神以及英雄主义气概都是当今中国文化所缺乏的,而其中最為或缺的则是个人性的勇毅气质。顾拜旦对拳击的评价很高,并保持着与古希腊人一样的热情:“崇高的拳击运动,是一项锤炼男子汉气概的运动,当摆脱了习惯于聚集在它周围,依靠寡廉鲜耻的剥削优胜者肌肉的经纪人之后,拳击将获得新生。”<sup>[5]81</sup>中国体育人秉承中国武士的精神传统,较为普遍性地体现出对知遇者的忠诚之心。田雨普在论述体育大国的概念时明确指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世界体育强国是新中国几代体育人梦寐以求的迫切愿望,也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为之奋斗的理想。”<sup>[13]</sup>田雨普的观点代表了诸多体育人的一种普遍的心境。强烈而单纯的忠诚心显示出一种巨大的力量,并在适当的时空中构成了中国人权力结构中的良性化元素。田雨普不断地强化出传统武士阶层对知遇者的报恩之情。“在我国和平崛起、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体育领域率先进军世界强国行列,具有鼓舞斗志、振奋精神的动员性和不范性,在国家发展中具有相当重要的战略意义。意义重大,任务光荣。既承载着党和政府的重托、各族人民的厚望,也是时代赋予我们这一代体育上作者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使命。”<sup>[13]</sup>2016年中国女排获得里约奥运会冠军后,央视网载文说明了其独特的精神药物价值:“感谢郎平,感谢中国女排,在奥运会即将结束的时候,不仅为国争光,更将国人的激情重新拉回了曾经的铁血年代。即使过去了三十多年,今天的我们在建设体育强国、实现中国梦的路上,女排依然是我们的精神良药。”<sup>[14]</sup>其实,“中国梦”是个中性化的概念,它是中国的国家行政管理体系发育到一定程度的产物。马国力曾对此作出了解读:“不可否认的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面,中国的社会缺少了一个整体的价值观。由于形式主义的官僚作风,官员们在台上说的话连他自己都不相信,这样的群体如何治理现代中国?以至于习近平这个管理团队用‘中国梦’这个中性的口号来替代原来的说教。但是如果还是用原来的治理方式和方法的话,好经一定会被念歪了,因为整个吏治群体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sup>[9]</sup>从现行的国家管理情况看,中国的吏治正在朝着优化的方向发展。具体到体育领域,体育改革和中国的社会改革也出现出相应的有序性、合理性和复合性。将女排现象和“中国梦”联系起来就带有行政学的合理性,却无法释然其中的身体学的非合理性。郎平可以是一

种精神性的“铁榔头”，却永远也无以具备在现实世界的超人特质。其实，郎平像许多杰出运动员一样，在运动员时代就积攒下来很多伤病，至今身上仍有不少不锈钢钉，因此可以说，隐藏在“铁榔头”英雄般称号后边的却是一种无尽的伤感，那里寄寓着一种特殊时代的生活和信念的印记。质言之，郎平之所以可以成为中国人再度回忆的对象，也因为其中寄寓着一种道德楷模的意味。当英雄主义的光环退却后，道德的火焰一定会升腾而起，借以填充中国宗教缺失后的所有空缺。

按照顾拜旦的说法，体育并非铁血精神的载体，即便是所谓的科学精神的绝对介入也会对体育造成伤害。“如果某些迂腐的科学渗入体育领域，教师热衷于研究训练肌肉的现代方法，成为著名的生理学雅各宾流派专家或者像任何政治上的雅各宾主义一样仅会醉心于纪律与统一，更不是一种进步。”<sup>[5]80</sup>来自西方的竞技体育的确很像是一种中国人经常服用的精神药剂，而非精神食粮。药剂与食粮具有质的迥异性，两者所呈现的更非一种纯然的等式，这样的非等式文化在中国的存在本身就值得中国人省思。质言之，中国的儒教文化中缺乏对恶的精神的尊重意向，于是，中国人在奥林匹克运动中寻找到了他们认为的一种无害的恶的精神元素，且立即将其当作一种心理补药，内中再现的是一种传播场域中的移情作用。现代体育的法统性、高尚性、道德的严明度，都足以构成一种现代性的主体，并为现代社会新成员的中国带来一种入门的证件。

### 三、崇尚私德的文化无法 缔造出真正的体育精神

尚德的概念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十分成熟。中国的武士也是道德律催生的产物。战国是一种士人公开言战的时期，更是一种天下人皆须征战的特殊时期，武士阶层大体维持在较为高端的地位上。当此之时，各诸侯国已然开始在道德的高地上展开较量，尚武之风时常要让位于尚文之风。苏秦、张仪以纵横家姿态横行天下的故事可以说明许多问题，诸侯国的文士已然成为一种相对的政治力量，它在开辟诸侯国政治新局面的同时，也将尚文的文化导向展示在世人面前。从终极的意义上考量，春秋战国时期文士的地位开始超越了武士，主要原因还在于文士更懂得如何使用道德武器，而失去了道德律的群体极有可能丧失其在上层社会的地位，并随时都有可能成为流民集团招抚和吸纳的对象。

在雷海宗的视野里，中国历史一直为两大势力所左右，其一为文士出身的儒人，其二为武士出身的流民集团，前者构成了一种士大夫团体，后者则成为屡遭后世诟病的流民团体。“在一盘散沙的社会状态下，比较有组织的团体，无论组织如何微弱或人数如何稀少，都可操纵一般消极颓靡的堕民。中国社会自汉以下只有两种比较强大的组织，就是士大夫与流氓。”<sup>[1]112</sup>雷海宗所说的“氓”指的是失去土地的男性民众，约略等同于现代汉语中的“流民”。雷海宗进而认为：“流氓虽然愚昧，但有时也有意外的成就。流氓多无知，流氓集团不能成大事；但一二流氓的头目因老于世故，知人善任，于大乱时期或能成伟人，甚至创造帝业。汉高祖与明太祖是历史上有名的这类成功人物。”<sup>[1]116</sup>雷海宗将汉高祖当成了非贵族出身的代表。“反动的势力把秦推翻，结果而有布衣天子的汉室出现。汉高是大流氓，一般佐命的人多为无政治经验的流氓小吏出身。所以天下又经过六十年的混乱方才真正安定下去。”<sup>[1]88</sup>流民集团具有尚武的倾向，此集团为中国后世体育人的原型，大量流民以身体打量天下，又以意志纵横四海，复以本能之力角竞逐于列国之间，奔走于朝廷内外，他们本可以成为中国体育人的杰出代表，却在日渐尚文的文化的氛围中艰难处世。中国的流民集团并未发展出类似欧洲的骑士理想。因为丧失了对公平决斗价值的追求动机，这一集团原本具有的高贵的气质也渐而丧失殆尽。从历史实情的角度看，流民的道德操守普遍险薄，其行为并不完全合乎主流社会的规范。流民们时而遁入反社会的领域，构建出一种社会的破坏性力量，而且许多破坏都是本能式、盲动式和为祸式的，缺乏基本的政治理性和人性的亮色。

中国的流民也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整体而言，中国人的流民大多讲义气，私德良好，而公德缺乏，其价值观基本上代表了中国社会底层人的做人准则。“松本一男认为中国人这种缺乏公德心的‘个人主义’以及‘爱财如命’，是上千年残酷的政治环境所造就的生存策略，是一种‘中国式智慧’——或许有人会认为不敢苟同，但细想其实不无道理。而且，个人以为：何止政治环境，就是从中国的传统文化来看，所弘扬的道德观也是以‘私德’为主，而非现代社会所提倡的种种‘公德’。”<sup>[15]</sup>中国流民集团中不乏分属于其支脉的侠客集团。侠客集团强调私德，同时也不排斥集团内的公德的正义性，而集团内的公德仍属于一种扩大化了的私德，而并非真正的公德。侠客如果失去了对外作战的机会，也便

很可能失去了富有正义感的勇气和斗志,其私德的比重就会提升,并最终酿成社会隐患。质言之,流氓尽管崇拜武力,但他们由于缺乏稳定的社会正义感和高尚的德行,从而背负着诸多的负面声誉,而其中的侠客集团很可能是其中维持一定公德心的人群,他们的道德律得到了后世文人的认可,被后世人们念念不忘的侠客也就此而成为武侠小说、戏曲中的主体人物。

因为主流宗教的缺失,儒家文化的主体在制定教化思想时一并连尚武的精神也掩抑下去了。当然,中国主流文化崇尚的文弱化的生活方式也会产生强大的社会感染力,它在适当的时期还会同化掉大量的外来蛮性文化。雷海宗认为:“中国虽屡次被征服,但始终未曾消灭,因为游牧民族的文化程度低于中国,入主中国后大都汉化。只有蒙古人不肯汉化,所以不到百年就被驱逐。游牧民族原都尚武,但汉化之后,附带的也染上汉族的文弱习气,不能振作,引得新的外族又来内侵。蒙古人虽不肯汉化,但文弱的习气却已染上,所以汉人不很费力就把他们赶回沙漠。”<sup>[1]125-126</sup> 后世津津乐道的所谓的汉唐人为正宗中国人之说,从相反的方面恰好说明儒学思想对人的本能欲望的压抑要超过其他宗教或文化类型。汉代是儒学的上升期,儒学的非健康的一面尚未来得及完全展开,换言之,儒学的危害性在汉代尚未完全显现出来。但是,汉武帝独尊儒术的策略的确为国家的文化建设作出了一个足以蚀灭其内在活力的负面性示范。吴蕴瑞认为:“汉高祖以马上得天下,不愿以马上失之,从子房之言,以清静治天下,经曹参陈王之赞助,提倡文治,重武轻文之空气,一转而为重文轻武。汉武帝用董仲舒之策,崇尚儒术,重文轻武之风为之根深蒂固。”<sup>[16]</sup> 尚文废武几乎成为汉代思想家们的共识,同时也很快就成为中国士绅集团人士的共识。唐代奉道教为国教,国家有其特殊的身体文化诉求,因此而营造出一种尊崇身体及其附属符号的文化氛围。

儒学本身就是一种道德律的综合体,而它迫害的武士则又在同样的道德巷道里与其展开决战,而战斗的结果是武士的私德败于儒家的公德。它昭示出中国体育人的必然宿命。中国体育人要想获得全社会的广泛认可,必须战胜私德为上的短板,在中国式道德律的场域里寻找到合乎更广泛正义性的道德力量。很显然,中国现代体育人并不具备对抗强大现代性德行的能量。中国现代中国体育人依然呈现出与非体育人不同的信仰和价值观,并具有精神自闭、人格孤立、自设禁忌的特点。现代

体育人的自我封闭、自我隔绝甚至自我逃亡的现象有其独特的文化缘由,而移除此种心理纠结的方法只能是一种价值观的重构。中国体育人的人格解放仅仅体现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之内,而在世界范围内,中国体育人和非儒教文化圈的人大体捍卫着相同或相似的信仰和价值观,这一点好像为他们获得了一定的道德优势。然而,中国体育人无须获得中国现有体制内价值观制定者对他们的彻底松绑,他们仅仅需要取缔儒学的独尊地位便可获得充分的价值自救。在与欧美文化接轨的视野上考量,中国体育人可谓一种先天的先驱者。远而观之,中国体育人的精神面貌得到彻底更新的日子才是中国人迈向现代社会的真正转机的时间节点。

必须重新回顾现代性的话语范畴。现代性是现代社会的价值核心,而现代社会是一种更高意义上的竞争社会。现代奥运会本身就具有身体关怀的特性,顾拜旦曾说:“现在复活的对体育的崇拜不仅仅改善了公众的健康。它传播一种乐观的坚韧精神,有利于帮助个人抵御生活中日常的磨难和沮丧。让我们祝贺我们的这些成果;但并非一切都因此完成了。现在轮到必须使精神从过度专门化强加于它的镣铐中解放出来,从狭窄职业的紧身衣中摆脱出来。向我们时代展开的广阔景象定会在积极人生的人口显示给每个人,即使只是作为瞬息的幻像。”<sup>[5]115</sup> 工业革命以后,由于竞争强度的社会提高,人的身体的重要性重新为人认知,体育的娱乐与休闲功能再度上扬,体育在高强度的现代性竞争的大轨道里充任着一种休憩、逍遥和自然至上者的角色,它再度显示出一种道德关怀的意向。有身体产生的暴力现象已经成为现代法制所禁止。司法决斗已为整个西方法律制度取缔,决斗业已成为触犯法律的行为。换言之,现代社会已然无法提供类似西方司法决斗那样的绝对的尚武理想了,现代性的尚武的理想或许已经内化为一种竞技体育或其他替代品,其中添加了不少看似娱乐至死的精神,也融含有身体的良性解放的意味。从总体的趋势看,现代人已经日渐失去了远古人的颠预无知的纯然的血性,高精度的法制建设让世界变得更为合理。世界上但凡社会秩序优良的国家都已成为法制建设严明的国度,换言之,法制建设的目的是为了呈现道德本身的价值,而世界范围内所有的体育人的真实的价值只能在这样的范畴内获得重新的认定。在此视野上观察中国体育人及其生存现状才显得合乎国情。

这里有必要对中国现代体育人的人格作出定

向性鉴别,且先从中国体育人的成长期看起。“由于体育特长生的情绪具有更为明显的两极性、冲动性和爆发性,情绪变化剧烈,常因一件小事而狂喜或者痛心,有时还会因为一点小事而与人大打出手,造成不良的影响和恶劣的后果。”<sup>[17]</sup>毫无疑问,以专业体育选手为代表的中国体育人常年投身于身体锻炼,导致其身体技艺的功能要远高于大脑的运作功能,这便极大地干扰了他们对常态化文化知识的认知,结果导致一种更为强烈的精神错位感。“训练消耗了大量精力,产生疲劳使大脑皮层机能下降,引起注意力分散,学习效率低,直接影响体育特长生的文化成绩,导致学生产生情绪紧张、焦虑、自卑等心理素质问题。”<sup>[17]</sup>任何社会都充满了互动性,道德歧视也会获得必然性的非道德的抗拒。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外界对体育人的歧视也会遭致他们适当的反抗,当体育人遭遇到不擅长体育运动的人时,同样会萌发一种歧视。探究体育教学模式的论著透露出了这样的信息:“教师不要歧视体育差生,而是要耐心引导、肯定、鼓励,并运用好的教学方法帮助他们克服心理上的恐惧,建立自信心。”<sup>[18]</sup>即便生活在教育体系内的体育人也有一些与人们惯常理解的行为和观念不完全相同之处。讲述课程改革的文章曾经间接地披露出体育人歧视体育差生的现象:“传统体育教学,偏爱体育优等生,冷落或歧视体育差生,使他们的心理受到伤害,怕参加活动,结果体育成绩越来越跟不上大家。”<sup>[19]</sup>中国的体育人歧视现象促使国人走向另一种极端境地,体育人不得不对文化人产生高度复杂化、矛盾化和飘移化的感情。金大陆认为:“如果一个国家的体育没有理论的营养和支持,这就将永远萎缩在工匠的层次上,永远被当作一种技艺供人欣赏。由此,它的组织者、参加者就不能得到公正的评价(请体会:为什么社会上有人会歧视体育专业),它的文化价值就不能得到真正的确证,它的社会功能也就不能得到真正的弘扬。”<sup>[20]</sup>心理关怀类书籍也将体育歧视当作一项必须回应的问题。“今天你的情绪不佳,而且你会揣测别人的动饥,无心的言词也会被你误解。不要歧视体育活动,如果你有做运动的习惯,要持之以恒。”<sup>[21]</sup>当今中国体育人在行事方面独具风貌,它看似一种孤立的现象,而实际上却是中国传统文化间接支配下的产物。在道德律失语、伦理失衡的语境中,任何一种非道德的抗争都具有片面的合理性。

中国体育人的典型性变异时间出现在汉代,促成此现象的代表性人物则是汉武帝。如果说汉高

祖刘邦是中国式自然体育无法发育成熟的一种象征性符号的话,那么,汉武帝刘彻则是彻底蚀灭中国体育人身体价值的代表性人物。在汉武帝以后的两千多年时间内,中国的身体文化处于一种隐秘性、羞耻性和非主流的地位。汉武帝曾经对尚侠者群体采取过格杀、平抑策略,结果导致武人地位急速下降,这便为后世江湖社会的出现埋下了伏笔。一部《水浒传》几乎可以看成是中国体育人的一本圣经,它同时也全方位地展现出一种中国体育人的文化生态保留地和精神避难所。《水浒传》或许是中国体育的基因库,但是,仅凭一部《水浒传》无法打造中国式的体育文化体系,恰相反,《水浒传》揭示出的只能是一种中国体育人的流亡史和遭受歧视与迫害的历史。《水浒传》之后的诸多武侠小说虽然都在竭力恢复中国武士的价值体系,但这些小说所描述的大量边缘人物的流亡的生活已经无法让人感受中国武士积极而正面性的价值了。在道德律丧失的前提下,刘邦主导的流民道德和刘彻主导的强权道德都有合理性,而一部《水浒传》则企图构建一种江湖道德。由于缺乏稳定、丰满、健全的宗教制度,中国人无法在道德的高地上停止争战。

现代体育看似来自西方,却也是人性自然性的一部分,它属于一种可供全人类共同接受的文化类别。现代体育尚武的价值取向就此也能和中国的尚侠者群体的信仰相提并论。中国并非所有人都崇尚侠义之道,也并非人人都崇尚武力至上主义,因此,西方的尚武思想始终无法获得中国全民性的认同。西方的体育文化传输到中国,立即激起了一部分中国人的身体、欲望与本能之活性,西方的竞技精神很容易被一些决心为顶级赛事金牌而搏的中国人的激赏。质言之,中国的尚侠者群体催生了后来的体育人群体。中国现代体育人由于得到了金牌主义、锦标主义、英雄偶像等文化元素的激励,进而建立起了一种高尚化的道德新秩序。由于主流性道德的缺失,一向以尚侠文化为主导性思想的中国现代体育人依然带有古代侠者的共同的文化品质,他们无论如何也无法摆脱固有文化基因的干扰,其内在精神只能处于一种相对性的与世隔绝的状态。中国体育的江湖化和江湖文化的体育化现象相映成辉,共同完成了一种古代江湖文化的现代转型图景。中国体育人在现时代的处境、地位、职能仍不明朗,中国体育人的逃离体育圈的现象很可能仅仅是古代武士流亡现象的现代翻版,而他们自造图腾、重设信念、自我封闭的价值选择再现的是古代遭受歧视与迫害的部落人士委屈求生的遗风。

在道德失度的境遇中,中国体育人无法获得存在的绝对合理性。

现代中国人追求西方式体育,其动机有多重性,但主要还在于引入西方公德,借以改造中国社会到处横行的私德。胡伊青加一度认可游戏的文化性。“生理的、智力的、道德的或精神的价值同样能把游戏提升到文化的高度。游戏愈能提升个人生命或团体生命的色调和强度,它就愈容易成为文明本身的一部分。”<sup>[22]</sup>中国体育人在现代社会的价值、地位、社会功用仍不明确,奥运会以及一些西方竞技体育类别可以为他们临时性地提供一种存在的合理性,但来自西方的体育品格仍旧无法和儒学化的东方主义人文精神完全兼容,中国体育人可以在西方体育的巨大影响力下固化一下自己的身份、价值与尊严,但是,无论任何一种来自西方体育文化的金牌主义或其他附加的荣誉,都无法彻底解救中国体育人,中国体育人仍在近乎偏执地在西方人设置的竞技体育项目中追逐金牌、银牌、铜牌之类的仪式化物质,且以此为标志获取举世公认的所谓的优胜感,这样的现象充其量也只能是一种饮鸩止渴式的精神或文化自救之道。那些获得了金牌、银牌、铜牌的中国体育人并未真实地提升其社会地位,他们所获得的荣誉仍是一种西方人设置的精神符号。西方体育的精华在道德的公正性,而中国社会所匮乏的恰是公德心及其营造出来的普世性的文化精神。

#### 四、结语

中国一度是一个竭力排斥尚武行为的国家,尚武的不合道德性一直是一种弥漫在全社会中的集体无意识。来自西方的竞技体育中的锦标主义只能给中国的体育人带来近乎灵光一闪的短暂的美好想象,无法终极性地在制度性、教化性和传统性的层面提升其地位。在文化变革的层面上考量,中国体育人的终极命运仍然是一种可供未来学家探究的艰深而充满精神抑制力的命题。现代中国正在急速推进现代化步调,中国体育人在摆脱了儒家伦理的牵制后反倒呈现出快速进入现代社会的势头。中国体育人在现代的群体性崛起预示着一种新时代的到来。就整体的发展态势看,现代中国儒学价值观日渐消隐,中国依然是社会主义国家,在中国现阶段的国家宪法中依然看不到有关儒学合法地位的片言只语。世界经济一体化时代的到来后,中国体育人的国际化处事方法更容易融入世界语境,而普泛价值观的通行全球,必然会大幅度地弱化中国体育人的心理自责意向,中国体育人的价

值体现在对国际性公德心的高度弘扬方面。在儒家伦理和西方公德的交织性博弈过程中,中国的体育人只能在国际性公德至上的高度上展示出自身的价值。

#### [参 考 文 献]

- [1] 雷海宗. 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M]. 长沙:岳麓书社, 2010.
- [2] 胡丽雯, 俄学者反驳对中国人偏见:他们善于数钱不好战[EB/OL]. 2015-09-29. <http://news.163.com/15/0929/01/B4L3N0MA0001121M.html>.
- [3] 胡适. 容忍与自由[M]. 北京:群言出版社, 2015:60.
- [4] [汉]司马迁. 史记·项羽本纪第七[M]. 卷七.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0:65.
- [5] [法]顾拜旦. 奥林匹克理想——顾拜旦文选[M]. 詹汝琮, 邢奇志等译. 北京:奥林匹克出版社, 1993.
- [6] Lord Macartney, An Embassy to China: Lord Macartney's Journal 1793-1794, Edited by J. L. Cranmer - Byne. Longmans, 1962. P. 87.
- [7] John Barrow, Travels in China, London, T. Cadell, 1804, P. 187. 引文参考蒋重跃, 刘林海译文. 转引自周宁编. 世界之中国:域外中国形象研究[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7:121.
- [8] 腾讯体育. 巴西溃败后该如何疗伤[EB/OL]. 腾讯体育·世界杯, 第35期. 2014-07-09.
- [9] 马国力. 体育应该是治国方略 新政需政府部门多项改革[EB/OL]. 2014-09-10. <http://sports.sina.com.cn/zl/other/2014-09-10/15581818.shtml>.
- [10] 彭懋栓主编. 人文奥运研究之四:人文奥运与首都文明城市建设[M].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6:79.
- [11] 天津市教育教学研究室编. 天津与世界教学参考书·5年级[M]. 下. 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 2007:289.
- [12] 雷默. 北京不出, 东京必胜[EB/OL]. 2013-09-08. [http://blog.163.com/andrew\\_r/blog/static/17417615020138855652939/](http://blog.163.com/andrew_r/blog/static/17417615020138855652939/).
- [13] 田雨普. 努力实现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的迈进[J]. 体育科学, 2009(3):3, 4.
- [14] 央视网. 有一种永不言弃的精神良药叫“中国女排”[EB/OL]. 2016-08-21. <http://news.cctv.com/2016/08/21/ARTIzBuoAmmfSLWNJBkBoLiC160821.shtml>.
- [15] 唐辛子. 日本学者笔下中国人的素质[EB/OL]. 2014-11-04. <http://cul.qq.com/a/20141005/004140.htm>.
- [16] 吴蕴瑞. 吾国体育不振之原因. 引自曹守詠. 中国古代的重文轻武及其对体育的影响. 中国体育史学会编. 体育史论文集(三)[M]. 1987:81.
- [17] 管格, 邱晋军. 高中体育特长生可持续发展的研究[J]. 科教文汇, 2008(9):181, 181.

- [18] 伟德. 体育教学模式论[M]. 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5:205.
- [19] 陆建豪. 浅谈调动体育差生体育锻炼的积极性[J]. 科学大众·科学教育,2009(6):20.
- [20] 金大陆. 体育美学:人·运动·未来[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212.
- [21] 陈诗理. 1994 星座宝典[M]. 第 SSZ 卷. 北京:金城出版社,1993:64.
- [22] [荷兰]胡伊青加. 人:游戏者:对文化中游戏因素的研究[M]. 成穷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59.
- (责任编辑:谢光前)

## **The Reconstruction of Chinese Sports People's Spirit: The Remedy of Public Morality to the Private Morality of Chinese Military People**

LU Yun-ting

(The School of Sports Journalism Communication and Foreign Language, Shanghai University of Sport, Shanghai 200438, China)

**Abstract:** The Western Sport, as a kind of high-end culture, has become a consumption for human beings all around the world. Religious exclusiveness of Confucianism in China resulted in undeveloped sports culture and the loss of competitive spirit directly shrunk the mental strength of Chinese. Discrimination of physical bodies has existed in both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However, there was no similar western reverent mechanism that "Humanity has the most evil side" in Chinese conception, which led to the extinction of competition in China. Taoism culture in China remained some elements about body care, but it eventually failed to create a type of high antagonistic body culture because of its lessened competitions. The existence of Chinese moral education in mundane world without God settled cultural tradition of emphasizing mental training in China, from which Chinese martial culture withered away under the hit of religious power. The decline of warrior practitioners had a negative impact on Chinese society. In modern society, the value, position and social function of Chinese sportsmen still remains unclear. Although Olympic Games and other western competitive sports events provide them with a temporary presence field, the western sports characters still can't be fully compatible with Confucian oriental spirit. To Chinese sportsmen, winning competitive sports events ruled by westerners can just be a kind of imagination for mental stability and moral salvation.

**Key words:** Warrior Morality; Mass Ethics; Duel Culture; Fate of Sportsmen